

汉日隐性性别词语对比研究

——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

华东师范大学 陈叶斐

提 要:与显性性别词语相比,揭示隐性性别词语背后所隐藏的性别意识问题,或许更能深刻地描画一个民族的性别文化观。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将汉日隐性性别词语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察对象加以探讨。旨在从文化史学角度揭示男权意识和妇女歧视问题如何通过隐性方式潜入词语之中,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汉日两种文化的审美价值取向,同时对其差异和成因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隐性性别词语;女性主义;集体无意识;汉日对比

隐性性别词语是指字面形态上没有性别标志,表面上看不出是指涉男性或女性,但却暗含性别指向的词语。关于汉日显性性别词语,早已有论著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和研究。但是,关于隐性性别词语,两国的研究却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讨论显性性别词语的论著里,会有一些隐性性别词语出现,不过,几乎没有作者明确提出“隐性性别词语”的概念,这些词语基本上也是附丽在显性性别词语之上进入论著之中。因此,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把隐性性别词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实际上是从文化史学的角度去探讨男权意识和妇女歧视问题是怎样通过隐性的方式“潜入”词语之中,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国民众的审美和价值取向。其背后所隐藏的“集体无意识”或许能够比显性性别词语更深刻地描画出中日两国在性别文化上的不同历史走向。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隐性性别词语,主要以词典释义为标准,即字面上没有性别指示符号(如“雌”、“雄”、“男”、“女”、“坤”等字样,或“女”字旁),但在词典释义中明确标明用于指涉女性或男性的词语。本文选取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和岩波书店的《广辞苑》(第五版)作为汉日隐性性别词语的样本采集对象。通过彻查这两本词典的方式,收集相关词汇。从汉语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大词典》中收集的词语,如词典名称所述,当为现代汉语中存在并使用的词汇。而《广辞苑》“是当今日本最负盛名的中型国语辞典,特别是1988年三省堂《大辞林》问世之前,其地位不可动摇,可谓一枝独秀,独领风骚”(潘钧,2008:279)。并且“其第5版的宣传广告词是‘私が、21世紀の日本語です’”(潘钧,2008:284)。

在本文的前期考察中,笔者发现:日语中指涉女性面貌丑陋的隐性性别词语和汉语相比有较大的差异。

例如,在目前收集到日语隐性性别词语中,形容女性体态肥胖的有「太」、「土仏」;将体格魁梧的丑女斥为「板額」。对于女性的面部,更是极为关注。如专门针对圆脸、高额头、丰颊、低鼻梁的女性的「お多福面」、「出出福」、「お亀」;鼻梁过高女性被称作「天狗の媒鳥」;「スベタ」原是指日本传统纸牌游戏中「めくりカルタ」中的一种花色,因为该花色不算分,被用来讽刺丑陋的女性,贬低她们的人格价值「人三化七」大致相当于汉语的“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但在日语中却专用来表示女性外貌丑陋「南瓜に目鼻」、「炭団に目鼻」的比喻十分形象,用来讽刺大脸盘或者肤黑女子。「狎くしゃ」中的「狎」是一种小型犬,而「くしゃ」则指「くしゃみ」,本来这种犬的口眼鼻凑得很近,打喷嚏时更是挤在一块,在日语中,被专门用来形容五官长得过于靠拢的女性。

这些词汇多用夸张、比喻手法,且「お多福面」、「スベタ」、「天狗の媒鳥」等都是日本文化中特有的事物。由此可见,日本民族对于女子的外貌体态之“丑”,是有一定标准的。大致可以归纳为:身体肥胖或体格魁梧、大脸、额头过高、鼻子比例失调(塌或者鼻梁过高)、小眼睛、肤黑。在一个如此在意女性外貌之“丑”的文化体系中,照理应存在大量的形容女性之美的隐性性别词语,但根据笔者目前的调查来看,情况却大相径庭。日语中形容女性之美的词汇大多数来自汉语,独具本民族特色的少得可怜。大有汉文化“传声筒”

之嫌。例如以下词语,皆可在汉语典籍中找到它们的源头。如「金蓮步/蓮步」出自《南史(齐本纪)》,「瓠犀、螭首、蛾眉」皆出自《诗经·卫风·硕人》,而「青蛾」、「秋波」、「太液の芙蓉」、「未央の柳」、「明眸皓齿」、「柳眉」、「柳腰」出典亦为中国古诗词。另外还有来自《韩非子·二柄》的「楚腰」、《庄子·齐物论》的「沉鱼落雁/羞花閉月」、以及来自《楚辞》的「窈窕」。

针对这些词语,笔者查阅了《中日对译语料库》,发现其中“明眸皓齿”、“沉鱼落雁”、“螭首蛾眉”日译例完全照搬汉语。说明这些词语对于一般日本读者来说,并不特别存在理解上的困难。

例1:……于是,翻山,翻过一道又一道的山,终于满身透汗地到了可以搭乘长途汽车的地方。还有那些女同志,一位明眸皓齿的女干部称颂着运动的深刻性,与倪吾诚后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称颂用词相同。

译文:……そして山越えである。幾つも幾つも越えて汗だくになって長距離バスの乗場に辿りつく。女子もいた。明眸皓齿のある女性は政治運動の素晴らしさについて賛辞を惜しまなかった。それは倪吾誠がのち文化大革命的の賞賛に用いたのと同類の最高級の字句であった。

例2: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又是一年芳草绿,爆竹声中一岁除。恩爱夫妻万事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子一生无非是贞节二字。好一个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罢、罢、罢。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译文:忠厚わが家に伝えて久く、読書世に継ぎて長ければ……。じゃに又も若草の春巡りきて、爆竹の音に去年送る。恩愛の夫婦儂しや。餓死とるに足りずも、節失するは事の大事。女子の生涯はただ貞節あるのみ。徒なるや、沈魚(西施)落雁(王明君)の容に、月影虚ろい(貂蝉)花も羞らう(楊貴妃)美貌じゃとて。さて、きて、さて。芍薬、牡丹の咲き揃い、花紅いに匂いたつ。

例3“螭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材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的是她红脸的时候。

译文「螭首蛾眉、齒如編貝」というきまり文句があるが、まったく先生にぴったりだった。華北の生まれで、肌はほんとうに白くて柔らかく、身体つきはしなやか。恥ずかしがったり怒

ったりされると、たちまち耳から首まで真っ赤になった。先生が顔を赤くされたときが、いちばん恐ろしかった。

与日语相反,汉语中存在着大量形容女性之美的隐性性别词语,《诗经·卫风》中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句,可说汇聚了汉民族评价美女的所有标准。后世文学作品中的引用更是不胜枚举。而如此注重女性之美的文化中,特别用于形容外貌丑陋女性的隐性性别词却是屈指可数——嫫母、无盐、孟光、以及阮德尉之女,这几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丑女,同时却也是品行高洁的典范,显示了与日本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

其次,在辱骂或嘲弄女性的隐性性别词语中,汉日语也显示出较为鲜明的差异。从目前收集到的汉语词条来看,汉语中斥骂女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淫荡”上。从辞典上收集到的词条来看,这类骂辞数量最多,有:暗门子、八大胡同、半开门、风骚、风骚货、狐狸精、狐媚、狐媚子、花货、烂货、破罐、破烂货、破鞋、骚货、水性杨花、偷人、下三滥、咸肉庄、养汉、妖精、野鸡、淫货。其次为贬低女性人格价值的骂辞:半边人、二手货、花瓶、贱人、赔钱货、人老珠黄、蹄子。再次为针对生活中比较强悍的女性骂辞:河东狮、泼悍、泼辣货。另外还有视女性为祸害的骂辞:白骨精、祸水。而日语中用来斥骂女性的焦点显然集中在“丑陋”上。『广辞苑』释义中注明“女をののしる”或“女をあざける”的隐性性别词语中,指涉外貌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些词语是:おかちめんこ、お亀・阿亀、お多福、スベタ、出出福、人三化七、太、炭団に目鼻、土仏、酉の待の売れ残り、南瓜に目鼻、板額、粉屋の泥棒、狃くしゃ。其次是用来斥骂下等妓女的词语:ふりばり、引張り、引裂かれ、踏ん張り。同时这些词语也可以作为针对一般女性的骂辞。值得注意的是,这不同于汉语中将指涉妓女的词等同于针对一般女性的骂辞的逻辑。另外还有三个词用于贬低女性的人格价值:引切り、引摺り、破れ子持。

第三,从指涉性服务业女性的隐性性别词语的角度来看,日语中有一类专门指涉妓女行业内程式化动作行为的词语。诸如「揚屋入り」、「朝帰り」、「粧作り」、「花魁道中」、「御茶挽き」、「返り花? 帰り花」、「顔見世」、「門立ち」、「客取り」、「出掛け姿」、「八文字」、「引き祝」、「二枚鑑札」等。这类词

语固然可以看作是日本色情业的行话俚语,但其在《广辞苑》中有迹可寻说明日本的风俗业相关词汇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具有存在的意义,而类似汉语词汇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早已不载^①并且在日语此类隐性性别词语中,还有一类对于妓女生涯寄予同情的说法,如「苦界」、「苦界十年」、「流れ」、「流れの里」、「流れの人」、「流れを立つ」、「川竹?河竹」、「籠の鳥」等。汉语中也存在悲叹女性身世的词,但似乎不特指妓女。汉语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妓女的冷嘲热讽。如“破鞋”、“野鸡”、“暗门子”、“咸肉庄”、“卖大炕”、“私门子”、“野草闲花”、“皮肉生意”、“老鸨”。无一不是刻毒的谩骂。从色情业隐性性别词语的多寡及涉及内容可见,中日文化中对于女性歧视的侧重点存在着不同。

二

中国社会从整体上来看,是一个价值体系一元化的体系(参见梁超群 2010)。即简单地将所有事物纳入到“道德”、“不道德”这一评判体系之中,而其余的价值评判体系都受它的制约。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就将“道德”作为区分人和非人的主要标准。导致“割裂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联系,走上了一条重视人的社会道德属性,抑制乃至泯灭人的自然属性的道路”(袁洪亮 2006: 26)。宋元以后的程朱理学,更是“进一步将个体与社会相分离,将‘人欲’与‘天理’相对立,崇‘天理’而损‘人欲’,重封建等级秩序而轻个体生存价值。致使关心人、重视人的先秦儒学进一步蜕化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吃人礼教”(袁洪亮 2006: 37)。表现在妇女评价方面,贞节观成为严重压制女性自由的精神枷锁。

在汉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对于女性的最根本也是唯一的价值判断是“贞洁”,即从一而终,凡是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一律斥之为“淫”。有学者指出,“贞淑”这一妇女观自汉代以后愈演愈烈,并“最终成为封建社会后期评价妇女的唯一准则”(刘福根 2008: 156)。在这样的单一准则下,“淫”成了妇女十恶不赦的大罪。电影《火烧圆明园》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年轻姑娘被八国联军强暴,她的父亲向她大吼:“你为什么不去死?!”结

果导致了姑娘投井身亡。这恰好成为上述文化心理的最好写照。在汉民族的妇女观中,凡是出现不正当性关系的,即使过错不在女方,“被玷污”也是一种罪。而这种“罪”是只能以生命为代价来洗刷。这样的逻辑即使在今天,仍然阴魂不散地徘徊在社会生活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妇女被强暴后大多数都不愿意报案或出庭作证,究其原因还是惧怕社会舆论。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提供性服务的妇女更是被视为下贱不堪的代表,其一举一动都为人不齿,是“正经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对于她们的指责,自然也极尽刻毒和冷嘲热讽之能事。从另一角度来看,“破鞋”、“野鸡”、“暗门子”、“咸肉庄”、“卖大炕”、“私门子”、“野草闲花”、“皮肉生意”、“老鸨”这些词语,除了特指从事性服务业的妇女之外,同时还兼有骂詈语的功能,并且后者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专门用来叱骂并非妓女的“良家妇女”。给“良家妇女”冠以妓女的称号,主要还是骂其“淫”。骂者以这类骂辞以期达到最大限度刺伤对方的目的,而被骂者则往往无地自容,倍感羞辱。“不贞”即“恶”、“有罪”的观念在汉文化中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社会评判妇女价值观的单一化现象,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汉语中指涉女性外貌丑陋的词汇的缺失问题。汉语中“丑女”隐性词的缺失,恰好是此种价值观的一种变相存在形式。美丽的女性可能引发男性性幻想,使男性不能自控,故也被归为“淫”,成为“有罪”、“邪恶”的一类。而“丑女”却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因此在汉民族的文化隐喻中往往和“有德”联系在一起。民间俗语“世上有三宝,丑妻、薄田、破棉袄”,即为上述思想的真实反映。“美丽”则专和“祸水”、“狐狸精”挂钩,归根结底还是指责美丽的女性“不贞”。男性站在本性别角度,将美丽女性对其在性别上的吸引归咎为女性的罪孽,以此来为自己开脱,这是典型的男权主义思维模式。美丑作为女性的最为显著的外在标志,常被当作对女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在多数文化中,美丽的女性往往被赋予优秀的品格,而丑陋的女性往往是邪恶的代表。而此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则行不通,甚至发生逆转,其关键还

^① 历代有关妓院的隐语有:瓦子、门户人家、百媚门程、粉房、锦屏围、翠红乡、花营锦阵、云雨乡、花胡同、花柳营、花粉楼、花街柳陌、么二、六跌倒、私局、私窠子、风月窝等称谓。另外,妓院行话在古汉语中也较为发达,例如明代把妓女头一次接客成为“梳梳”,清代称妓女调换妓院为“调头”等。(见郝志伦《汉语隐语论纲》巴蜀书社 2001)

是在于“淫贞之辨”成为了妇女观的唯一准则。对外貌美丽的异性抱有憧憬和幻想是人之常情,但中国的男性一方面对美女不吝赞美之词,另一方面又在潜意识中将她们视为危害自身的洪水猛兽,这不能不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心理扭曲,也是造成对女性丑陋顾左右而言他的深层次原因。前文提及的嫖母、无盐等词汇所包含的文化隐喻,正是这种心理在语言上的无意识折射。

另一方面,在指涉女性的汉语隐性性别词语中,多将女性“货物化”或者“动物化”,也与道德评价有着密切关系。儒家思想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袁洪亮,2006:26 转引自杨柳桥《王制·荀子诂译》,齐鲁书社1985年版)。因人有道德,故处于宇宙天地的“上位”。这种重人而轻万物的思维和“男尊女卑”相结合,就产生了以下思维模式:男性占道德优势,处“上位”,因此是“人”;而女性处于道德之“下位”,与男性相比照,要低“人”一等,故为草木、为畜牲、为物品。不仅贬损女性的骂词如此,例如把个人生活放荡的女子称作“淫货”、“花货”、“花脚猫”、“狐狸精”、称青春不再的女性为“人老珠黄”、把在日常生活中的强悍女性称作“河东狮”、“泼辣货”。甚至连含褒义的词汇也暗含此等逻辑,例如将美貌女子称作“尤物”、将贞洁女子(当然也是男权的评判标准)称为“白璧”、形容女性身体“软玉温香”等。表面看来,这些词语似乎只涉及“男尊女卑”,实质仍是“道德/非道德”这一深层机制在发挥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中也存在贬损男性为畜牲、货物的隐性性别骂辞。例如贬低贫穷男性的“穷光蛋”、斥骂老年男子的“老甲鱼”,但数量以及花样翻新程度远远不及针对女性的骂辞。斥骂男性性生活放荡的词语也仅局限于“油头光棍”、“色鬼”、“色魔”、“色狼”等个别词汇上,数量和刻毒程度与针对女性的同类骂辞亦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这类针对男性的隐性性别骂辞的存在,表明汉文化的道德评价机制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其数量之少又表明中国社会男人掌握了

话语权及其对女性的宰制和压迫。

三

尽管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在日本毕竟属于舶来品,不像在中国那样根深蒂固,有些与日本本土文化有抵触的东西还被拒绝接受,从整个日本社会史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日本的很多制度、习惯都是与儒家伦理背道而驰的”(李卓,2006)。日本文化在吸收融合他国文化的表层下,一直延续着自身的特点。深层次的文化特质是不会轻易消失的,这使得日本社会在模仿中国制定律令之始,即将不符合日本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些条文去除^①。因此,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泛道德论”式的思维并没有在日本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使日本社会文化价值评判体系多样化。它既可以借中国文化观来评价“美丽”或“贞节”^②的女性,也可以对游离这一价值体系外的女性采用另一套评价标准。

在日本,对于是否具有家庭伦理身份的两类女性,评价标准完全不同。对于家庭内的妇女,在“江户时代,对女子规定的戒条有:不合家风者要被休掉,不能生儿育女者要被休掉,妒忌心强者要被休掉,为人妻者要早起晚睡,不许馋嘴等……在1898年颁布的民法中规定:为人妻者没有丈夫允许不可拥有财产,不可向人借钱,不可诉讼”(李先瑞,2008:9)。而被称为“风俗业”的性服务行业,对女性的要求则完全不同。日本女子有时被家长卖为娼妓,但“在家的制度下,为了家的利益和对父母尽孝,子女理所应当要牺牲个人的幸福。在此伦理思想的指导下,女性出卖肉体也被理解为一种“奉公”。被出卖而操性服务业的女性,还清家庭债务后,也不会因此影响谈婚论嫁,这在中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而日本的艺伎,在某种程度上比一般妇女享受着更大的自由。例如吉原的“花魁”,可以自由选择客人,如果客人不守规定,则会受到来自于妓女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艺伎能够受到来自日本上层社会政要或商人的保护和资

① 例如“当古代日本人制定律令的时候,尽管在许多方面都模仿了唐制,但对于同姓不婚的禁忌和近亲相奸的‘内乱’罪都毫不犹豫地舍弃,就连参与制定《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的重要人物藤原不比等也是与同父异母妹结婚,说明日本人未将同姓不婚的禁忌写入律令绝不是偶然的疏漏,而是这种法律根本就不符合当时日本的风俗,因而排拒之。”参见李卓《日本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中的‘非儒’因素》《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② 与女子贞操相关的隐性性别词方面,日语也几乎都是汉语的翻版。如「貞操」、「貞淑」、「貞節」、「貞烈」、「三從」、「七去(出)」等。说明在贞操观方面日本文化也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助。波伏娃所说的“让男人付给报酬,就等于把他变成了一种工具”(西蒙娜·德·波伏娃,1998:643)在此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另一方面,“艺妓的文化影响已经遍及日本,艺妓特有的温顺体贴成了日本共有女性美的理念。艺妓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日本当今社会的诸多方面”(王慧娟,2008)。在此,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受男权压迫,而走向对自身性别价值肯定的过程。这种始于对男性话语权的认同,终于内化、升华为自身独有的价值观,在日本文化吸收、融合其他文化的过程之中也能见到。日本民族的这种文化特性由此可见一斑。

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符号化定义不外乎两类,一类是社会伦理符号(具有家庭身份的女性),另一类则是色情符号(非家庭的女性)。在中国,由于儒家的泛道德论过于发达而占据了统治地位,后者的评价机制自然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虽然中国自古以来不乏赞美色情业妇女的诗词,但对其社会身份评价一向极低,更遑论像日本那样把娼妓之美作为社会的通行理念。相比之下,日本社会的“伦理度”则较低。例如日本的家族延续并非以血缘为主,日本“承袭男性祖宗血统的伦理,在日本远不及中国浓厚”(雷华,2000)。中国文化中被视为乱伦的婚姻关系、领养关系在日本文化中都被认可。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日本文化对于中国儒教的“贞操观”也仅限于表面上的模仿。在词语方面则表现为贬低、嘲讽丑恶女性的隐性性别词较汉语发达。其分类、描述之细微具体,非汉语可比。另外,日语中指涉女性性服务业的词汇没有特定的贬义,甚至将汉语中一些赞美女性的褒义词语,用来特指妓女。例如“倾国倾城”在汉语中指的是绝色佳人,在日语里除了指美女之外,还专指妓女。此外还有「君倾城」、「倾城町」、「倾城代」等。“温柔乡”在汉语中指美色迷人之境,而在日语中有专指妓院之义^①。“洞房”在汉语里常用来特指新婚夫妻的卧室,而在日语中却有妓女的卧室或妓院之义^②。“红楼”一词,在汉语中指富贵人家小姐的居所^③,而在日语中,除了上述意思之外,还可用来指妓女的房间

或妓院^④。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日本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定义更多地倾向于后者,即从色情符号的角度对女性进行压制,迫使女性关注自身的外貌和体态,自觉地迎合男性的性幻想。

以上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汉日语隐性性别词语做了一个初步的对比分析。从中可见,尽管汉日语的隐性性别词语在女性歧视方面表现不同,反映出不同社会文化下不同的男权思维模式,但女性作为被压迫的对象这一点是相同的。正如李银河指出的那样,“我们全都生活在严重程度不同的男权制社会当中”(李银河,2005:178)。并且“女性主义来自西方,但它不是西方女性的专利,当然更不意味着来自西方的理论就必然囿于偏见。……哪里有男性中心文化的存在,便会产生对这种存在的认识和抗争,便会产生女性主义的文化思潮和社会实践”(李先瑞,2008:89)。不过,女性主义只是汉日隐性性别词语对比研究的一个视角,改换视角,还有更多可以探讨的内容。

参考文献

- 高宁 2009 汉语隐性性别词语初探——从文化翻译学的角度谈起,『中国語研究』第51号。
- 雷华 2000 竹取物语与古代日本的伦理、君权意识,《日本研究》第2期。
- 李先瑞 2008,《本能主义者的精神幻灭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作品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李卓 2006 日本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中的“非儒”因素,《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梁超群 2010 文化翻译:缺省与补偿,多元与一元,《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第4期。
- 刘福根 2008,《汉语詈词研究——汉语骂詈小史》,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 潘钧 2008,《日本辞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慧娟 2008 日本艺妓文化,《世界文化》第2期。
- 西蒙娜·德·波伏娃 1998,《第二性II》,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 袁洪亮 2006,《中国近代人学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 (通讯地址:200241 上海市东川路500号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文字编校:王亚民)(下转第84页)

① 『广辞苑』: [趙飛燕外伝] 温かく柔らかな郷里の意から(美女、あるいは遊里? 色里。また、ねや。閨房。

② 『广辞苑』: ①奥深いへや。ねや。閨房けいぼう。②遊女の閨房。女郎屋。妓楼。

③ 《辞海(1979年版)》对于“红楼”的释义如下:华美的楼房,旧常指富家女子的住处。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韦庄《长安春》诗“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

④ 『广辞苑』: ①朱塗りのたかどの。富家の女の住居。②妓楼。遊女屋。

层面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 Cao Xueq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1978. Trans.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Cao Xueqin. 1983.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rans. David Hawk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Davidson, D. 1984.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 Quine, W. 1960.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Ricoeur, P. 2006. *On Translation*. Trans. Eileen Brenn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earle, J. 2001. "Indeterminacy, Empiricism, and the First Person". In A. P. Martinich (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Y: OUP.
- Steiner, G. 1998.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Clarendon: OUP.
- Shuttleworth, M. & M. Cowie. 1999. Indeterminacy. In M.

- Shuttleworth & M. Cowie (eds.).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 陈波, 1996 奎因的语言哲学, 《北京社会科学》第 4 期。
- 陈波, 1998 《奎因的语言哲学——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 北京: 三联书店。
- 宫军 2010 从翻译的不确定性看译者主体性, 《外语学刊》第 2 期。
- 郭建中, 1999,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李德超 2004 翻译理论的哲学探索: 奎因论翻译的不确定性, 《上海翻译》第 4 期。
- 刘宓庆 2007, 《翻译与语言哲学》,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孙冠臣 2004 奎因彻底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 《现代哲学》第 1 期。
- 王丹阳 2003 翻译的不确定性: 原因·表现·启示,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3 期。
- 徐盛桓 2007 认知语用学论纲, 《外语教学》第 5 期。
- (通讯地址: 10002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文字编校: 陈家刚)

Quine's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by WU Guangjun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at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Quine's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Quine's contribution lies in: 1) ontological validation of translatability; 2) epistemological corroboration of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3) methodological probe of radical translation. Quine's limitations are: 1) a behaviorist view on meaning; 2) fuzziness and impracticability of sentence categorization.

Key words: Quin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translatability

(上接第 20 页)

Comparative study on covert gender word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by CHEN Yefei

Abstract: Examining covert gender words, in which sexist mentality deeply hides, may more profoundly expose a culture's view on the two sexes. This paper,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comparatively studies covert gender word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ims to discover how masculinity and prejudice against the female sex became covertly accepted in the two languages, and tries to explain how such linguistic phenomenon influences aesthetics in the two cultures and to compare their causes and difference.

Key words: covert gender words; feminism; collective unconscious;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